

杂文随笔自选集
高洪波



高洪波杂文随笔自选集

高洪波 著

群言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洪波杂文随笔自选集/高洪波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12

ISBN 7-80080-151-9

I. 高…

I. 高…

■. ①杂文—中国—当代—选集

②随笔—中国—当代—选集

N. I267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印刷厂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插页 147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I·28 定价:7.20元

目 录

- 1 敢于说“不”
- 3 坦荡人生
- 5 文坛的红白喜事
- 7 精品意识
- 9 正史与野史
- 12 龚自珍嗜赌
- 14 文化打假
- 16 江湖侠骨
- 18 编辑难当
- 20 由“万石君”想起
- 22 贝石思
- 24 监狱文化
- 27 武侠乐趣
- 30 闲话“文坛十大”
- 32 首购九四
- 35 林下与灯下
- 37 精神诈骗
- 39 恨不起来

- 41 制服热
- 43 论从容
- 46 如此药方
- 48 印数 111
- 50 豪华的“废品”
- 52 坐隐与手谈
- 55 偶饮“文酒”
- 59 谈电视小品的庸俗化
- 61 龚炜说诗
- 63 文人八相
- 65 和珅的诗
- 67 小金库与私房钱
- 69 话说名片
- 71 “雅戏”别谈
- 73 “痰派”及其他
- 75 难得糊涂
- 77 也谈导向
- 79 象牙与鸦片
- 81 “作品讨论会”之讨论
- 83 杨万里和廉政
- 85 山东名虫
- 88 神的能量
- 90 诗因人显
- 92 酒食地狱
- 94 那五的产生
- 96 有感“铁如意”铭文

- 99 绣御手情结
101 贾迎春的灯谜
103 曾国藩与《歧求诗》
105 《子夜》的妙用
107 属相与生日
109 故纸堆中
111 晴雯老了怎么办
113 欢的性别
115 “完整”的遗址
117 革命与小酒
119 盗亦有道
121 又一长联
123 “搞”与“混”
- 125 聚散偶得
129 醉界
132 逛论
135 九曲艸公
138 不妨一哭
141 本来面目
145 人在旅途
148 墨趣与砚韵
152 古玩
157 鹤鹑
161 生活意象
166 照相杂谈

- 169 稿费
174 邂逅
177 笔记
181 书斋石
184 艺术细胞
188 贮云
191 合子饭
194 看通宵电影
196 知音解
199 享受旅途
204 城饰
205 宠物
208 酒人
211 丢钥匙
214 互为风景
217 名人别墅
221 妻子的眼睛
223 丫丫日记

敢于说“不”

都说人情大于王法，这是古训，也说明了中国社会的特质：重情面。重情面的社会好处是火到猪头烂，没有办不成的事，前提是您得求准了人。不好的地方是人在人情在，人一走，茶就凉，不光缺乏法制社会的严谨，还透出了世态炎凉的辛酸。

由于重情面，故而一些话显现出人情社会的实质。两个人见面，一位请另一位做客，这位被请者有事不能赴宴，掏钱者不乐意了，递上一句：“您驳我的面子！”另一位一听话茬儿不对头，咬咬牙，跺跺脚，天大的事也先搁一边，陪，舍命陪君子，不，陪面子。

故而不到万不得已，中国人极少驳别人的面子，或者说极少说一个“不”字。当面回绝，让人下不来台，哪成?! 活得明白的中国人不这么干，即便摊上事该说“不”，也曲里拐弯东绕西扯，文人称之为“婉转”。杨贵妃死时，诗人叹为“婉转蛾眉马前死”，婉转得不是地方，后人办事讲究的婉转，那韵味就不同了，是成熟的智慧、练达的人生。譬如某次应酬您不想出席，在请柬上写一个“谢”字，人家就知道您不去了；若写上“忝陪末座”呢，得，留您一个席位，候您大驾好了。

以上说的是旧俗，现如今则更简单或更复杂，说出“不”字的难度似乎也高了许多。

也有敢于说“不”的，像钱钟书先生对于时下里流行的祝寿、开纪念会、学术讨论会，一律拒绝，他一连串说出七个“不”字：“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在钱先生眼中，那些活动可有可无，有之不增一分光彩，却之不减一毫快慰，听到钱钟书先生的“不”字，颇有痛快淋漓之感。这是自信，也是自豪，对于那些惯于嘯聚起哄之徒，不啻是一记闷棍。

无独有偶，作家协会不久前辞世的老书记葛洛先生，临终遗言亦有几个“不”字，葛洛在遗嘱中说道：“那一天到来后，不发讣告，不印发生平事迹，不举行告别仪式和任何悼念活动。骨灰不长久保留，可用简便方式抛撒在中华大地上，使我回归大自然。”

葛洛遗言中的“四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行为方式，较之那些倍享哀荣以至福衍子孙的人们来讲，境界不知高了多少！

敢于说出一个“不”字，实是向传统的习俗挑战，不媚俗，不从众，特立独行，所以一言既出，警策人心。

故而笔者以“敢于说‘不’”为题，向人情社会下一道战表，好在关于“不”的规定中尚有“不唯上，不唯书”的“二不”，这是鼓励我们说出“不”字的最坚强的后盾。你的敌人其实就是你自己，战胜懦弱，克服羞涩，抛掉顾虑，大胆地对你不愿意承认、不乐意接受的事情说一个“不”，胜过一万个“委曲求全”。

试一试。

坦荡人生

关于人生的话题，极多。

豪迈者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深沉者道：人生路漫漫，吾当上下而求索；

乐天派呷一口老酒，又说出另一番话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悲观者则长叹一声，皱起眉头告诉人们：人生如梦，胡不及时以行乐？

人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如爱情一样。人生又是一个短暂的话题，与爱情同样相似。对于生命整体而言，只要人类群体存在，则人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对人生意蕴的追寻会一代接一代地延续下去，这里面涉及种族的文化背景、地域的宗教范畴等，所以说人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人生却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伟人的一生与凡人的一生，同样赤条条地来，又无牵挂地走，“公道人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讲的就是这么个人生哲理，所以说人生短暂。

但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物，大猩猩也许是人类的分枝兄弟，但大猩猩们绝对不会思考人生、琢磨爱情，继而研究异性寻求伴侣。真正意义上的思考，非人类莫属，人类也正是因为

思考，才引得上帝发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位叫米兰·昆德拉的家伙不怀好意地念叨过的。

上帝爱笑不笑，他笑也好，不笑也罢，对于自己的生命状态、生存方式及各种需求状况的思考，确实是人类的本能，否则我犯不上写这篇文章。

我想说的是一种自己认可的生命态度，这就是本文的题目——坦荡人生。

坦荡人生的楷模，照我看来古有李白、苏东坡，这是两位极有性格的文豪，稍有一点文学史知识的朋友，都会认同我的界定。李白诗极多，但最妙的一句，也就是我写这篇小文时挤入笔尖下的头一条诗歌意象，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活脱脱地刻画了李白的坦荡性格。苏东坡的妙句也不少，“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边策杖散步，一边快乐地吟啸出苏式怪声，在此时此刻，什么名利，什么地位，似乎都全然被吟啸的快感代替，“一蓑烟雨任平生”，多坦荡的夫子。

今人亦不乏坦荡者，如文人萧军，武人陈毅。这二位够得上是坦荡君子，上承李、苏遗风，下启军心文心。对于陈老总的坦荡，我们已知道许多，而萧军一生因坦荡获罪，历尽坎坷，却值得另一篇文章去陈述了。

坦荡人生，需要一股正气、一腔热血；更需豪气干云、光明磊落，凡事拿不起放不下，瞻前顾后，左右逢源，那不是坦荡，是投机。用一句术语说：风派人物。

中华民族文化中盛行的多是韬晦、藏锋、含而不露，要么是大智若愚、后发制人，这些古训制成诸多人生的假面、思想的铠甲，让人们一一穿戴起来，故而坦荡难觅，坦荡人生罕见。鉴于此，我才坦率地向读者朋友进一言：人生何妨一坦荡！

文坛的红白喜事

随着新闻媒介的增多，传导给人们的文坛信息量也自然而然加大，这种加大的一个突出印象，如果说前一时期是“文坛官司多”的话，去年以来则变为“红白喜事”多了。

所谓的“红白喜事”，是一种比喻，红指的是婚姻，白指的是死人。仅就笔者粗浅的了解，文坛一批老作家，先有杨沫，继有徐迟，最近则有冯亦代与黄宗英，各自以自己的婚事给文坛添了不少喜兴。说到“白”事，惨了点，先是路遥、邹志安中年弃世、壮志未酬身先死，继有诗人顾城杀妻之后的自杀，介乎凶手与疯子之间的行为方式，给文坛添了许多阴霾。诗人似乎爱走极端，短短几年间，女诗人蝌蚪切股动脉自杀，让一条毛毯沁满了鲜血；青年诗人海子卧轨自杀，用二十五岁的生命奉祭了缪斯女神。海子死后不久，他的好友兼责编骆一禾亦以年轻的生命随他而去。骆一禾是《十月》的青年编辑，他的死是缘于脑瘤。

这一连串的中青年作家的死亡，配以幸福的老前辈们的婚姻，给人一种古怪的印象，在文坛，老有所养，老有所恋，老作家们结婚或离婚，结婚成为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离婚亦成为新闻，让满世界跑舌头。似乎文坛是仙坛，出一种返老还童丹，专门让老作家们恢复二度青春，然后穿礼服披婚纱去气青年后生小子。君不见有人撰文专门介绍老作家们的幸福婚姻，直至一篇访问

记访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君不见在记者笔下，徐迟的婚姻分明成了天造地合，而冯亦代与黄宗英已经在准备搜集出版“两地书”，有情人终成眷属，仿佛身体力行，成为琼瑶小说的男女主人公……

真不知文坛怎么回事？

笔者曾结识过几位文学圈外的朋友，在他们眼中，文坛并非那末圣洁，颇不以“灵魂的工程师”们为然，这每每令人尴尬。愤愤地，我举出一批杰出的作家来应对，说明这是一批人品文品俱佳的国家栋梁、民族精英，他们如何以自己的心灵营养着一个民族，用自己的才华与智慧营造文化的宫殿，点燃民族精神的烛火，启迪人类愚蒙，如鲁迅、茅盾、冰心、巴金，如丰子恺、赵树理、沈从文……圈外的朋友顿时语塞，但稍停一顿，他却顺口举出一连串文人无行的典型例子，我自然噤声，转而将怒火烧向新闻媒介，为什么？盖因为生老病死、结婚离婚本是人之常情，将人之常情加以不必要的夸饰和渲染，便具有了新闻效应，便能吸引读者。殊不知这样一来，新闻效应倒是有了，结果却是文坛的红白喜事招致了社会的沸沸扬扬的议论，新闻界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文艺界的名声，真的是不够朋友！

文化名人们结婚，本是人家的个人稳私，八十岁也好，九十岁也罢，是生活与感情需要，新闻界别搅进去抓噱头添乱，甚至追踪报道。这种起哄式报道，当事人也未必不反感。给名人一点清静，好不好？

拜托诸位，笔下留情。

精品意识

李苦禅先生是众人皆知的国画大师，他的鹰极有性格，而且鹰的眼睛一律是——方形，或者说棱角分明，故而给人一种逼人的“草枯鹰眼疾”的英气！看李苦禅大师的鹰，你会想到许多鹰的文化背景与自然环境，觉得如果鹰不长着这么一双方眼，反倒不那么正常似的。李苦禅的鹰自然属于精品。苦禅大师显见得也是精品意识颇强的人。其实不尽然，还有比精品更高的艺术，即神品。

苦禅语录云：“画有精品，有神品。精品可以功力得之，神品则功力不逮者固必不可得，而功力即具者亦不可必得。”好一个“必不可得”与“不可必得”，充满了艺术的辩证法，非对画理有精深研究的苦禅大师，一般人真难以悟出个中道理。

照苦禅大师的意思，精品是多数，神品因为是画家在“意兴所至，信手挥洒，心纸无间，笔墨契合，才情风发，妙造自然”的状态下创作的。故而十分难得。精品的产生需要勤奋创作，神品的诞生则光凭勤奋还不成，还需要灵气、灵感与灵光。故而神品是可遇而不求的，精品则是凭人力可以得到的。一个画家一生中可能留下众多的精品，但达到神品的标准者一定寥寥无几。因为即便一个画家穷尽毕生心血，具备了相当深厚的功力，“不可必得”四个字，道破了他未必能达到的自己生命与艺术极限的秘密。

巴尔扎克创作《人间喜剧》煌煌巨著，精品极多，《贝姨》、《邦斯舅舅》等都当之无愧，但神品可能只有一部《欧也妮·葛朗台》，老葛朗台的形象实在是那一时代的典型。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近三十册，也是同样的比例，而且仅仅是精品与神品，内中不乏凡品——没有一定的数量便达到不了一定的质量，精品出自凡品，神品源于精品，这是一种艺术的递进规律。

精品意识之说，或许来自于商业领域的广告宣传，如“××精品大展”或“××精品屋”，其实精品不是艺术的极致，真正有志气的作家应冲击神品的高峰，当然前提是提高自己的艺术功力，由“必不可得”进入“不可必得”，继而去领会那种“信手挥洒，心纸无间”的意趣，从而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神品”，方不枉在人间“潇洒走一回”。

重要的是别自己哄自己，拿凡品当精品，甚至神品。

正史与野史

读正史与读野史，似有两般滋味儿。

一般说来，正史像不苟言笑的学究，逼着你正襟危坐聆听教诲；野史则迹近佻达放肆的文人，茶一杯烟一支甚至酒一盅，斜倚仰面哪怕大头朝下读都随你的便，怎么自在怎么行事。

正史之名始于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到了有清一代，纪晓岚替“十全老人”乾隆皇帝编辑《四库全书》，正式确定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并立一条规矩：凡不经“宸断”（皇帝批准）的不得列入，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野史要随便得多，《辞海》上的定义为“中国古代私家编撰的史书”。后来发展到外史、稗史、轶闻，反正皇帝没功夫“宸断”，也不可能御览到的，统统称之为野史。

我这人喜欢读野史，不久前在琉璃厂购得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的13册《清稗类钞》，大喜过望，趁兴阅读，结果刚看到第一册就有体会。

第一册分类很详尽，从“地理类”、“名胜类”直到“宫苑类”、“园林类”，最后一部分涉及“帝德类”、“恩遇类”、“巡幸类”等，讲的全是皇帝家里的私事，我先读到一则写乾隆（即高宗）游江南的记载，题为《高宗南巡供应之盛》，讲的是乾隆第五次南巡时到镇江的实况。乾隆乘的御舟离镇江还有十余里地时，远远看到岸上有“大桃一枚，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爱”。船渐行渐近，忽然烟

火大发，火焰四射，俄顷之间，大桃“砉然列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原来这大桃是一座活动剧院，够气派的吧？

刚翻过一页，又读到一则皇帝西狩的记载，比南巡可惨多了。当然西狩的不是乾隆，而是他的后代“德宗”（即光绪），文章题为《德宗西狩手携小匣》，极短，姑且全文录之如下：

光緒庚子拳匪之亂，八國聯軍入京，孝欽后挾德宗出走，皆單衣也。德宗捧小匣一以從，日夕不去手。至懷來縣，某貢子接之，啟視，則其中藏南棗五枚、燒餅一枚而已。

此处讲的是慈禧老佛爷和光绪皇帝 1900 年“庚子之变”时的狼狈状态，身为帝王的光绪竟可怜到如此地步，手抱一匣小零食而“日夕不去手”，但皇帝也是人，也得吃东西，所以他也没法子。

乾隆南巡与光绪西狩的两种境遇，实则说明了创业与守业的因果关系。我觉得古人说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确乎有他的道理，因此得出结论：野史不可不读！

写至此，本想结束此文，但忽然想起不久前赴保定开会，在那里听到一则关于慈禧的故事，可与《清稗类钞》相映成趣：

慈禧与光绪 1900 年 8 月“西狩”陕西，1901 年 11 月回京，途经保定时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了讨好主子，下令将永宁寺（今保定二中）改为行宫，一位老工匠巧妙地将一座凉亭亭顶造成了“莲叶托桃”的样式。慈禧来行宫游赏时，看见这水灵灵翻卷的大莲叶托起的仙桃，竟怒火中烧，传旨促拿设计亭顶的匠人，就地凌迟处死！

原来“莲叶托桃”者，乃“连夜脱逃”之谐音也。此桃与乾隆南巡之桃，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吧。